

轉型正義的數位人文取徑嘗試： 以傅正在《自由中國》有關黨產議題 文章為例

薛化元¹、江子揚²

目次

壹、前言：兼述數位人文取徑

貳、量性偵測：實驗產出與呈現

參、質化詮釋：人文研讀與討論

肆、結論

參考文獻

1 政大台史所教授兼文學院院長。

2 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副研究員。

摘要

威權時刻不當利益所得，特別係針對黨產部分的處理，一方面標誌過去對財產的不法侵占，另一方面並牽涉到民主轉型後政治場域的政黨公平競爭情況，因此不僅影響轉型正義工程落實，並為評量國家民主品質乃至民主深化與否的重要指標。《自由中國》作為 1950 年代到 1960 年代間台灣社會議論時事，政策辯證乃至引介西方思潮的重要刊物，通過考察《自由中國》可以進一步理解當時台灣民間與學界思想發展與脈動。

數位人文研究係人文社會領域一個新興研究途徑，旨在傳統質化研究之外，透過資訊工具進行量性分析，再將實驗結果結合人工判讀的科技整合模式。本文透過數位人文取徑的應用嘗試，就傅正針對黨產議題，在《自由中國》所發表的有關文章進行討論。本文研究發現：傅正在針對黨產議題時，係如同剝洋蔥般由遠而近、由外而內、由周邊附隨組織再到國民黨中心進行的敘寫軌跡。傅正身為《自由中國》編輯委員除具備一定代表性外，其在《自由中國》所發表多篇有關黨產議題的文章也是值得現代思索與參考。

關鍵詞：傅正、《自由中國》、黨產、轉型正義、數位人文研究

壹、前言：兼述數位人文取徑

轉型正義工程作為近代民主化進程的重要環節，其工程實踐成效不僅是民主轉型過程重要內涵，更是評量一國民主品質乃至民主深化與否的重要指標，其中歷經政治變遷後，針對威權統治期間不當利益所得有關研究，其中又以黨產問題最具代表性，不僅是台灣也是國際間進行轉型正義工程國家首要任務之一，因其標誌作為民主機制重要內涵的政黨政治是否完備，以及各政黨間競爭是否具備公平性。

置諸戰後台灣史發展脈絡，《自由中國》是 1950 年代到 1960 年代間台灣社會議論時事，政策辯證乃至引介西方思潮的重要刊物，因此透過《自由中國》可以進一步理解當時台灣民間與學界思想發展與脈動。傅正身為《自由中國》編輯委員並為多篇社論撰寫者，其具有一定代表性。針對威權時期國民黨政府黨產問題的討論，傅正可視為先驅者，並透過在《自由中國》文章發表與討論，將此情況進一步向民間社會批露與闡述。而作為本文主要研究方法的數位人文途徑，下文首先將就數位人文途徑進行介紹與說明。

資訊科技蓬勃發展使得人類歷史發展邁向一個新的里程碑，對人文社會學科研究而言，尤其是表現在史料、典籍、檔案等文獻儲存、檢索以及搜尋等方面，進而成就保存與研究之用³，其中，史料文物的數位化展示，以及相關的多元化資訊服務實為未來發展之必然趨勢⁴。隨著科技日新月益的發展，運用數位技術

3 黃寬重，〈數位典藏與人文研究－中央研究院文獻資料數位化工作的回顧與展望〉，《漢學通訊研究》20 卷 8 期（總 78 期）（2001 年 5 月），頁 68。

4 謝顯丞、錢曉珊、黃淑屏，〈數位典藏之推廣應用與社區服務－以鳳甲美術館刺繡館藏為例〉，《圖書與資訊學刊》3 卷 1 期（總 76 期）（2011 年 2 月），頁 34。

將價值性文明資產予以保藏⁵，除使得文明資產不再受實體與空間的侷限⁶，更可達到資訊流的垂直承繼⁷。數位時代屆臨意味，促使為數碩多的資訊透過數位化過程，以全文抑是圖檔等模式，建構起資料庫，並透過網站的應用平台，提供研究者資料搜尋與檢索之用，進而啟動人文研究與資訊科技的整合機制⁸。

數位人文研究試圖透過資訊採擷 (data mining) 與文本採擷 (text mining)，發掘繁瑣資料的內部隱含關係⁹。在數位人文的脈絡下，研究者可藉由資訊技術的應用，從大量繁瑣的史料檔案中採擷相關所需資料，而對多元、豐富的資訊流進行保藏與儲存，同時更奠基於此，得以克服時間與空間的侷限，發掘史料背後的隱含意義及其脈絡軌跡，進而透過多重向度對歷史發展進行分析與詮釋¹⁰。並且，藉由數位人文學方法，除可以重覆驗證的統計數據，除可加深前人研究成果的支持或修正外，亦能補充

-
- 5 就資訊儲存而言，metadata 在數位化後的資訊保存與典藏層面，具備著關鍵的功能、作用，而數位典藏工程除能真實反映出文化與自然風貌的多元化外，亦能對在地的文化內涵產生深化的作用，不過，在此，特須注意的是，數位資訊檔若無進一步對其結構及意義，進行分析與詮釋，則其價值應用性將微乎其微。李峻德、曾馨瑩，〈公民數位典藏平台之使用者研究〉，《第三屆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研討會論文集》，2011 年 12 月 1-2 日，國立台灣大學，頁 287。以及陳和琴，〈Metadata 與數位典藏之研討〉，《大學圖書館》5 卷 2 期 (2001 年 9 月)，頁 5。
 - 6 陳詩沛、杜協昌、項潔，〈史料政體分析工具之幕後—介紹「台灣歷史數位圖書館」的資料前置處理程序〉，項潔主編，《從保存到創造：開啟數位人文研究》(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1 年 11 月)，頁 53。
 - 7 廖彩惠、陳泰穎，〈從文明科技發展看數位典藏的時代意義—本質、迷思與發展趨勢〉，《國家圖書館管刊》98 年 2 期 (2009 年 8 月)，頁 85。
 - 8 陳品諺、彭維謙、項潔，〈《清實錄》之文本分析與時間標記初探〉《第三屆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研討會論文集》，2011 年 12 月 1-2 日，國立台灣大學，頁 259。
 - 9 針對資訊採擷，項潔、涂豐恩更進一步指出，其主題可包括分類 (categorization)、分群 (clustering)、推估與預測 (estimation and prediction) 以及連結分析 (linking) 等。項潔、涂豐恩，〈導論—什麼是數位人文〉，項潔主編，《從保存到創造：開啟數位人文研究》(臺北：臺大出版中心出版：臺大發行，2011 年)，頁 20。
 - 10 Peter K. Bol, “Historical Research in a Digital Environment”, 《第三屆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研討會論文集》，2011 年 12 月 1-2 日，國立台灣大學，頁 1。

傳統研究法之不足。同時，透過資訊科技的應用，可使研究者能迅速地勾勒出觀念發展圖像，並藉圖像的觀察而挖掘出「歷史殊異點」，而使得研究者能進入研究的核心焦點，進而在此基礎上進行歷史解釋¹¹。

應用數位人文途徑所進行的歷史研究，可從兩個面向進行探討：一、計量史學 (Cliometrics) 的統計方法嘗試；二、數位典藏以及資料庫的建構¹²。歷史數位資料庫創建伊始，即在為求克服計量史學失敗的前提下應運而生。歷史數位資料庫¹³係以協助研究者應用史料為出發，憑藉保存史料脈絡以取代詮釋模型的建立，並透過多媒體與網際網路技術，將大量的史料以資料庫形式存放於網路上，進而提供歷史研究者繁瑣資料的統計運算，以及關鍵詞彙¹⁴檢索之用¹⁵。

數位人文途徑所標誌的社會實踐創新意涵，則進一步體現在幾個層次上：首先，藉由資訊科技的程式運算，得以迅速將原難以全面採擷的史料證據系統化呈現予國內外社會；二者，數位技

11 金觀濤、邱偉雲、劉昭麟，〈「共現」詞頻分析及其運用—以「華人」觀念起源為例〉，《第三屆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研討會論文集》，2011年12月1-2日，國立台灣大學，頁214。

12 項潔、翁稷安，〈數位人文與歷史研究〉，《數位人文在歷史學研究的應用》（臺北：臺大出版中心出版：臺大發行，2011年），頁13。

13 雖說數位技術的應用，提供研究者諸多便利性與多元資料採擷，不過王汎森認為，治史的首要條件仍無法脫離研究者對文獻的縝密解讀，而在歷史的詮釋過程中，資訊科技應視為研究工具的一種，發揮「畫龍點睛式的輔助作用」。王汎森，〈歷史研究的新視野：重讀〈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古今論衡》11期（2004年），頁6-7。

14 關鍵詞彙應用的價值在於，採擷詞彙背後所隱含的觀念邏輯與世界觀，並藉由對詞彙亦義演變之掌握，而勾勒出當時的時空背景與社會意識，進而透過觀察詞彙觀念的演變發展，以汲取歷史的真實性。邱偉雲，〈關鍵詞彙與文本意義挖掘的嘗試：以《清季外交史料》為例〉，項潔（主編），《數位人文在歷史學研究的應用》（臺北：臺大出版中心出版：臺大發行，2011年），頁163。

15 項潔、翁稷安，〈數位人文與歷史研究〉，頁14-15。

術對資料的巨量整合性，可縮減資料彙編的時程，而更將彙編成果更具時效性的傳播、流通；三者，過往，由於史料的搜尋不易，導致研究者傾向對小規模範疇進行描述性研究，如今，憑藉數位科技的應用，研究者得以嘗試就大範疇的歷史課題，進行研究與提出歷史詮釋；四者，就過去所懸而未決的史實，能夠透過科技進行快捷的還原與重建，以協助爭議問題的化解；五者，藉由數位檔案的應用，可提昇歷史研究的產量成果¹⁶。

置於數位人文脈絡下，研究者可藉由資訊技術的應用，從大量繁瑣的史料檔案中採擷相關所需資料，而對多元、豐富的資訊流進行保藏與儲存，同時更奠基於此，得以克服時間與空間的侷限，發掘史料背後的隱含意義及其脈絡軌跡，進而透過多重向度對歷史發展進行分析與詮釋¹⁷。並且，藉由數位人文學方法，除可以重覆驗證的統計數據，加深前人研究成果的正當性外，亦能補充傳統研究法之不足。同時，透過資訊科技的應用，可使研究者能迅速地勾勒出觀念發展圖像，並藉圖像的觀察而挖掘出「歷史殊異點」，而使得研究者能進入研究的核心焦點，進而在此基礎上進行歷史解釋¹⁸。

數位人文研究係人文社會領域一個新興研究途徑，旨在傳統質化研究之外，透過資訊工具進行量性分析，再將實驗結果結合人工判讀的科技整合模式。本文研究方向，即希望透過數位人文

16 林滿紅，〈數位化：史學與社會結合的一大契機〉，項潔（主編），《數位人文在歷史學研究的應用》（臺北：臺大出版中心出版：臺大發行，2011年），頁45-46。

17 Peter K. Bol, “Historical Research in a Digital Environment”, 《第三屆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研討會論文集》，2011年12月1-2日，國立台灣大學，頁1。

18 金觀濤、邱偉雲、劉昭麟，〈「共現」詞頻分析及其運用—以「華人」觀念起源為例〉，《第三屆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研討會論文集》，2011年12月1-2日，國立台灣大學，頁214。

取徑的應用嘗試，就傅正針對黨產議題，在《自由中國》所發表的有關文章進行討論¹⁹。

貳、量性偵測：實驗產出與呈現

本文主要以傅正在《自由中國》所撰寫並內容涉及黨產議題的文章，包括：〈青年反共救國團問題（「今日的問題」）之十二〉²⁰、〈扼殺民營報紙的又一辦法〉²¹、〈撤銷軍人之友社！〉²²、〈請投在野黨和無黨無派候選人一票！〉²³、〈國庫不是國民黨的私囊—從民社黨拒受宣傳補助費說到國民黨把國庫當作黨庫〉²⁴等作為實驗偵測標的。

首先，在實驗操作第一階段，本文利用電腦自動斷詞系統所斷出的若干詞彙，再透過人工判讀並篩選出與黨產議題相關的詞彙，包括：黨營事業、黨庫、國庫、黨費、日產、蘋果、救國團、津貼、公帑、黨報、官報、民營報紙、貸款、軍人之友社、軍友社、勞軍、補助。其中，由於軍人之友社與軍友社指涉相同概念意涵，因此透過權威控制 (Authority Control) 操作²⁵將此兩詞

19 本文部分內容參考並改寫自薛化元，〈傅正與黨產研究 學術研討會主題演講 黨產研究之父：傅正〉，《黨產研究》3期（2018年10月1日），頁133-142。

20 社論（傅正），〈青年反共救國團問題（「今日的問題」）之十二〉，《自由中國》18卷1期（1958年1月1日），頁5-7。

21 社論（傅正），〈扼殺民營報紙的又一辦法〉，《自由中國》19卷6期（1958年9月16日），頁6。

22 社論（傅正），〈撤銷軍人之友社！〉，《自由中國》21卷7（1959年10月1日），頁4-6。

23 社論（傅正），〈請投在野黨和無黨無派候選人一票！〉，《自由中國》22卷8期（1960年4月16日），頁3-4。

24 社論（傅正），〈國庫不是國民黨的私囊—從民社黨拒受宣傳補助費說到國民黨把國庫當作黨庫〉，《自由中國》22卷11期（1960年6月1日），頁3-4。

25 權威控制 (Authority Control)，意旨「藉由標目的一致性，以及建立參照關係將不用與相關的標目連結起來。獨特性、標準化及連結性是權威控制的特性」，並且「個人名稱及團體名稱、

彙進行合併，並以軍友社作為代表詞彙。

其次，再以前述與黨產議題相關詞彙為本，透過資訊工具回到文本進行詞頻量數偵測，實驗產出結果如下：「黨營事業」共在 1 篇文章中出現，並詞頻次數為 2；「黨庫」共在 1 篇文章中出現，並詞頻次數為 4；「國庫」共在 1 篇文章中出現，並詞頻次數為 11；「黨費」共在 1 篇文章中出現，並詞頻次數為 17；「日產」共在 1 篇文章中出現，並詞頻次數為 1；「蘋果」共在 1 篇文章中出現，並詞頻次數為 1；「救國團」共在 2 篇文章中出現，並詞頻次數為 50；「津貼」共在 3 篇文章中出現，並詞頻次數為 5；「公帑」共在 1 篇文章中出現，並詞頻次數為 3；「黨報」共在 2 篇文章中出現，並詞頻次數為 20；「官報」共在 1 篇文章中出現，並詞頻次數為 16；「民營報紙」共在 1 篇文章中出現，並詞頻次數為 9；「貸款」共在 1 篇文章中出現，並詞頻次數為 3；「軍友社」共在 1 篇文章中出現，並詞頻次數為 29；「勞軍」共在 1 篇文章中出現，並詞頻次數為 40；「補助」共在 2 篇文章中出現，並詞頻次數為 17。並依前述數據進一步繪製成下表一：

劃一題名、標題等進行一致性及建立參照的工作，使得目錄上所有的檢索點皆具有獨特性，不會產生混淆，同時又能使得與這些標目有關的詞彙，產生關聯性，讓使用者由任何一個詞彙查尋，皆可獲得完整的資料」。洪一梅，〈論檔案檢索工具的權威控制系統〉，檔案管理局（編），《檔案資訊資源管理》（臺北市：檔案管理局，2004 年），頁 412。

表一 黨產議題相關詞彙的篇數與詞頻量數關係

詞彙	篇數	詞頻	篇名
黨營事業	1	2	國庫不是國民黨的私囊—從民社黨拒受宣傳補助費說到國民黨把國庫當作黨庫 (1960/6/1)
黨庫	1	4	國庫不是國民黨的私囊—從民社黨拒受宣傳補助費說到國民黨把國庫當作黨庫 (1960/6/1)
國庫	1	11	國庫不是國民黨的私囊—從民社黨拒受宣傳補助費說到國民黨把國庫當作黨庫 (1960/6/1)
黨費	1	17	國庫不是國民黨的私囊—從民社黨拒受宣傳補助費說到國民黨把國庫當作黨庫 (1960/6/1)
日產	1	1	國庫不是國民黨的私囊—從民社黨拒受宣傳補助費說到國民黨把國庫當作黨庫 (1960/6/1)
蘋果	1	1	國庫不是國民黨的私囊—從民社黨拒受宣傳補助費說到國民黨把國庫當作黨庫 (1960/6/1)
救國團		47	青年反共救國團問題 (「今日的問題」) 之十二 (1958/1/1)
		3	國庫不是國民黨的私囊—從民社黨拒受宣傳補助費說到國民黨把國庫當作黨庫 (1960/6/1)
(救國團) 小計	2	50	
津貼		1	青年反共救國團問題 (「今日的問題」) 之十二 (1958/1/1)
		3	撤銷軍人之友社! (1959/10/1)
		1	請投在野黨和無黨無派候選人一票! (1960/4/16)
(津貼) 小計	3	5	
公帑	1	3	青年反共救國團問題 (「今日的問題」) 之十二 (1958/1/1)
黨報	1	19	扼殺民營報紙的又一辦法 (1958/9/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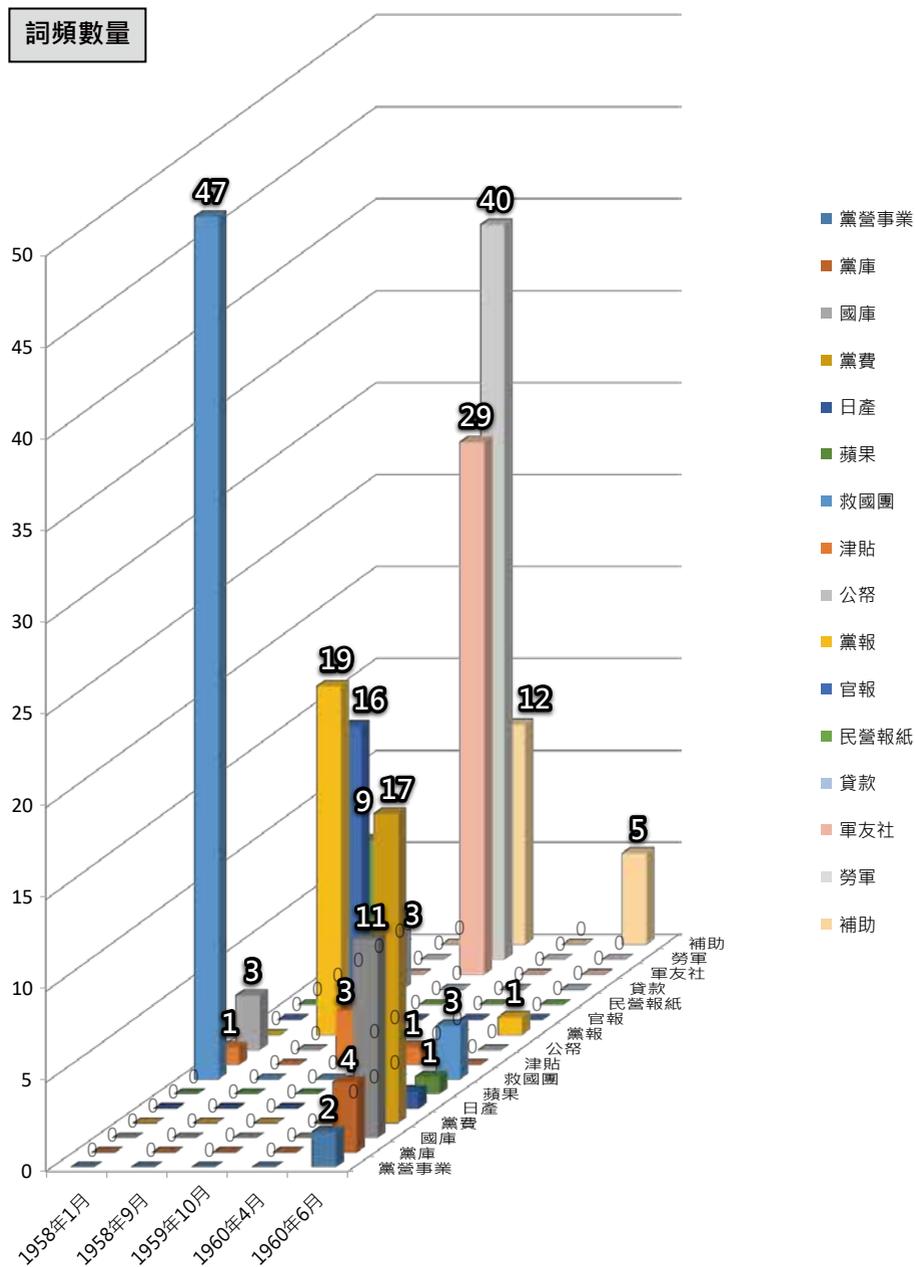
詞彙	篇數	詞頻	篇名
	1	1	國庫不是國民黨的私囊—從民社黨拒受宣傳補助費說到國民黨把國庫當作黨庫 (1960/6/1)
(黨報) 小計	2	20	
官報	1	16	扼殺民營報紙的又一辦法 (1958/9/16)
民營報紙	1	9	扼殺民營報紙的又一辦法 (1958/9/16)
貸款	1	3	扼殺民營報紙的又一辦法 (1958/9/16)
軍人之友社	1	2	撤銷軍人之友社！ (1959/10/1)
軍友社	1	27	撤銷軍人之友社！ (1959/10/1)
(軍人之友社 + 軍友社) 小計	1	29	
勞軍	1	40	撤銷軍人之友社！ (1959/10/1)
補助	1	12	撤銷軍人之友社！ (1959/10/1)
	1	5	國庫不是國民黨的私囊—從民社黨拒受宣傳補助費說到國民黨把國庫當作黨庫 (1960/6/1)
(補助) 小計	2	17	

透過表 1 所示，可以發現傅正在《自由中國》所撰寫有關黨產議題的文章中，與黨產議題相關的詞彙，其詞頻量數排序前十者依序為：救國團（50 次）、勞軍（40 次）、軍友社（29 次）、黨報（20 次）、黨費（17 次）、補助（17 次）、官報（16 次）、國庫（11 次）、民營報紙（9 次）、津貼（5 次）。再進一步分析前述數據，可以發現：

- (1) 1950 年到 1960 年間，針對國民黨政府黨產問題進行討論時，現行主流用語 - 黨產此一詞彙在當時並非慣用語，此外包括黨營事業與黨庫等詞彙亦同，而黨產一詞甚至未在文本出現過。
- (2) 1950 年到 1960 年間，針對國民黨的附隨組織已開始進行討論，以傅正文章為例，在其文中提到救國團、軍友社等，並且此兩詞彙一者是詞頻數量排序第一；另者是排序第三，都是作者慣常使用的詞彙。
- (3) 此外，詞頻量數排序第九者的民營報紙，主要是作為黨報與官報等對立詞使用。而詞頻量數排序第二者的勞軍，作者主要是藉勞軍捐贈之事來討論黨產的來源，並且蘋果與日產也是用作黨產來源的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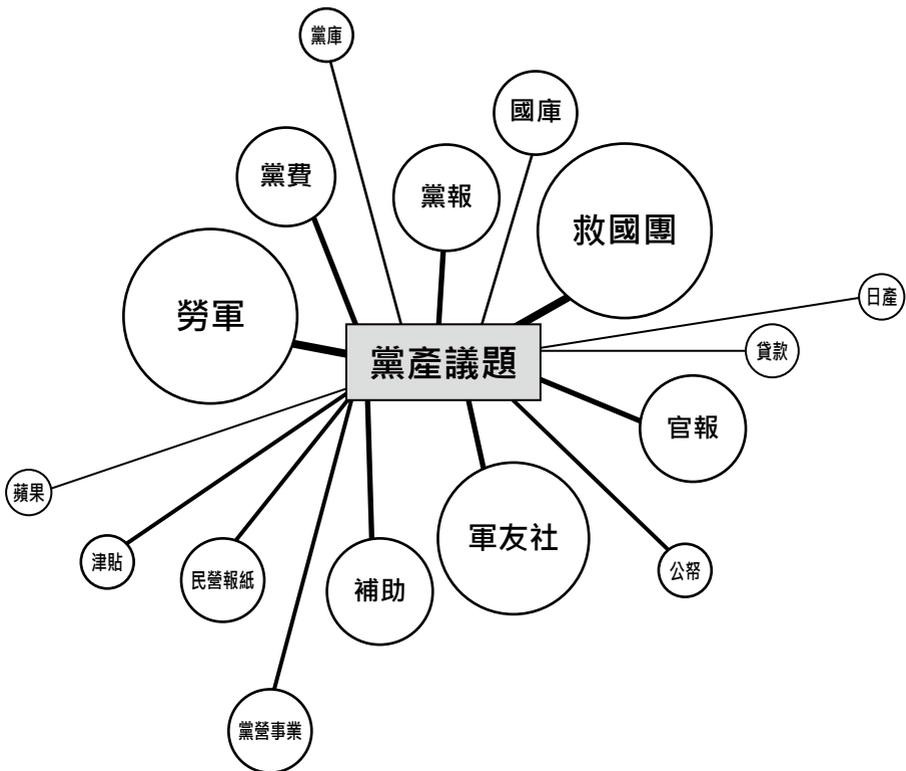
再者，本文再以前述所得的詞頻量數作為基底，進一步探查 (1) 不同年度的詞頻多寡量數情況以及 (2) 排序前十詞彙在不同年度的消長分布。並繪製如下圖 1 與圖 2，其中縱軸表示詞頻數量，橫軸表示年度時間。

圖一 黨產議題有關詞彙在不同年度的詞頻多寡量數情況



本文透過以黨產議題作為中心的關聯網絡圖，進一步呈現傅正在《自由中國》文章所提到有關黨產相關概念詞彙的詞頻量數情況，並且其中圓圈大小與線條粗細與該詞彙在文本出現次數成正比關係，即針對黨產議題的討論，若圓圈越大以及線條越粗表示該詞彙在文章中頻繁被提及；反之，則討論情況較不明顯。換言之，進一步分析文章所彰顯的是，當時國民黨的不當利益所得來源主要透過救國團與軍友社這兩個組織運作，並常以勞軍相關費用為名進行金流捐獻。

圖三 傅正在《自由中國》文章以黨產議題作為中心的詞彙關聯網絡圖



參、質化詮釋：人文研讀與討論

針對國民黨黨營事業或黨產來源描述，其中第一篇是有關救國團的文章〈青年反共救國團問題（「今日的問題」）之十二〉，首先傅正即就救國團成立與性質提出質疑，表示「這一個單位究竟是何種性質，社會上還普遍的感到莫名其妙」，並且參加方式如同過去三民主義青年團，係採「強迫參加」方式²⁶，並進一步指出救國團成立依據則僅經1952年9月的一紙「行政院臺四一教字五二六五號訓令」核准²⁷。再者，針對救國團弊端進行討論，其中有關「浪費公帑」部分，因為當時「在國家財政萬分困難的關頭，任何大小單位，都該盡力節省開銷，早成為公認的真理；但青年救國團卻運用特殊的方式與關係，在各方面要津貼找財源，而置國家財政於不顧。例如去年（四十五年）一年的開銷，據傳便高達臺幣三億元左右」²⁸，特別是「青年救國團卻運用特殊的方式與關係，在各方面要津貼找財源，而置國家財政於不顧」²⁹，此外，在當時書刊出版難如登天的時空背景下，救國團有關出版品不僅出版毫無價值書刊且如此方便，「即此一點，其浪費公帑事的事實，便不難想像了！」³⁰，這是最早提到的內容。

26 社論（傅正），〈青年反共救國團問題（「今日的問題」）之十二〉，《自由中國》18卷1期（1958年1月1日），頁5。

27 社論（傅正），〈青年反共救國團問題（「今日的問題」）之十二〉，頁6。

28 社論（傅正），〈青年反共救國團問題（「今日的問題」）之十二〉，頁6。

29 有關針對青年反共救國團問題的描述，原文如次：「在國家財政萬分困難的關頭，任何大小單位，都該盡力節省開銷，早成為公認的真理；但青年救國團卻運用特殊的方式與關係，在各方面要津貼找財源，而置國家財政於不顧。例如去年（四十五年）一年的開銷，據傳便高達臺幣三億元左右，這當然是青年救國團的高度機密，非局外人所能証實。」。傅正，〈青年反共救國團問題（「今日的問題」）之十二〉，頁6。

30 社論（傅正），〈青年反共救國團問題（「今日的問題」）之十二〉，頁6。

在〈扼殺民營報紙的又一辦法〉中，傅正特對於當時表示國民黨立場的官報、黨報，分別就資金、設備、發行、廣告等四個層面分析道，與民營報紙的營運相比，指出官報與黨報不僅「常能從台灣銀行或其它金融機構獲得大量低利貸款」，並且「常能很方便的獲得外匯配額」，而「有些民報根本上禁止軍隊閱讀，而官報黨報則由政府與黨的力量協助推銷」，此外，「廣告方面，政府機關公告集中刊載於官報黨報，民報僅得分潤其餘額」³¹。回到 1950 年代、1960 年代初期報業歷史發展軌跡，當時最主要的在野報紙是由李萬居負責的《公論報》。而李萬居的《公論報》停辦原因在於：(一) 資金調度出問題。資金調度出了什麼問題？因為當時要買印刷用紙，取得與價格是官方控制住，要有足夠的金額才能做這件事情，相對於國民黨的黨報可以從台灣銀行或者從其他的金融機構，當時台灣所有的商業銀行基本上都是國家經營³²，只有一、兩間例外，例如：華僑銀行是僑資，由國家掌控，因此能取得低利貸款。(二) 廣告收益挹注。廣告牽涉到國家的資源如何做分配？或有沒有不當的分配，如《自立晚報》寫文章批評政府，廣告被省政府下令全部抽掉³³。但是中央

31 針對國民黨扼殺民營報紙的分析，原文如次：「1. 在資金方面，官報黨報常能從台灣銀行或其它金融機構獲得大量低利貸款，而民報則獲得貸款甚為困難，因為臺銀及其它金融機構都掌握於政府之手。2. 在設備方面，官報常能很方便的獲得外匯配額，隨時換展與改進，而民報則無此方便。3. 在發行方面，有些民報根本上禁止軍隊閱讀，而官報黨報則由政府與黨的力量協助推銷。4. 在廣告方面，政府機關公告集中刊載於官報黨報，民報僅得分潤其餘額，即此餘額，亦隨時可以藉故（『自立晚報』和『商工日報』之廣告被省府於本年七月取消，便是眼前最好的例子。）取消。國民黨機關報的『中央日報』貸款案，早在九月一日由台灣銀行董事會通過，准許獨借一百萬元之數。又如國民黨另一份黨報『中華日報』，原已直接向台灣銀行借過六十五萬元之多，雖由於該報之沒有銷路而無力還債，但最近卻又借國民黨中央財務委員會名義，再向台灣銀行另借到一百萬元之多」。社論（傅正），〈扼殺民營報紙的又一辦法〉，《自由中國》19 卷 6 期（1958 年 9 月 16 日），頁 6。

32 社論（傅正），〈扼殺民營報紙的又一辦法〉，頁 6。

33 原文如次：「在廣告方面，政府機關公告集中刊載於官報黨報，民報僅得分潤其餘額，即此餘額，亦隨時可以藉故（『自立晚報』和『商工日報』之廣告被省府於本年七月取消，便是眼前最好的例子。）取消」。社論（傅正），〈扼殺民營報紙的又一辦法〉，頁 6。

財務委員會並非是法人組織，原則是無法借貸的，此外也需要理解到，國民黨以前不只說不是法人，因為當時沒有登記，黨產名義上也不是目前所想像登記在國民黨名下，很多是在私人的名下，因此在文末傅正針對此一情況，指陳「扼殺民營報紙（也就是扼殺言論自由）的一貫路線之一新的發展」³⁴。

在〈撤銷軍人之友社！〉一文中，傅正再就當時未經合法程序通過設立的若干機關，如軍人之友社，並針對其性質進行討論，傅正指出「軍友社這個組織，在法律上的地位，固然應該是屬於人民團體；但從事實上分析，卻又變成了政府機關」³⁵，直接表示軍人之友社「這一特殊組織，除掉可以如同政府機關一樣，每年由省政府的預算中獲得固定經費外，又可以透過政府的權力，假借勞軍的美名，向各業、各縣市進行變相的強迫捐獻」³⁶，如「外匯附捐」與「勞軍經費」等名目開

34 社論（傅正），〈扼殺民營報紙的又一辦法〉，頁6。

35 社論（傅正），〈撤銷軍人之友社！〉，《自由中國》21卷7期（1959年10月1日），頁4。

36 有關就軍人之友社的描述，原文如次：「軍友社此一組織，既非「民」非「官」，又似「民」似「官」，幾乎不知道究該稱之為人民團體抑或政府機關。其實，軍友社正是利用這一點方便，一方面打著人民團體的招牌，一方面擺出政府機關的面孔，而以雙重身份在社會上出現，用各種手法搞錢。因此，這一特殊組織，除掉可以如同政府機關一樣，每年由省政府的預算中獲得固定經費外，又可以透過政府的權力，假借勞軍的美名，向各業、各縣市進行變相的強迫捐獻。僅就該社四十八年度的歲入歲出預算書分析，便足以瞭解一般實情。此項預算書，是在今年六月二十日經由該社第四屆第三次常務理事會審議通過，最後在八月七日奉國防部核准的。據歲入預算書上所列預算數字，合計為一千八百七十餘萬元（一八、七八二、三〇〇元）。僅就這一筆錢而言，軍友社究決定如何使用呢？這可列舉歲出預算書上的幾個數字，加以具體說明。根據歲出預算書的分配，其中「文化勞軍費」一項，佔去一百四十二萬八千元。然而，此所謂「文化勞軍費」，在名義上，固然包括有「建立醫院文庫費」、「充實戰地文庫費」、「書籍勞軍費」、「青年戰士報補助費」、「軍友月刊補助費」等五個小目；但在實際數字的分配上，僅僅「青年戰士報補助費」，便佔去一百零三萬二千元；「軍友月刊補助費」，又佔去九萬六千元。這樣分配的結果，剩下的總共便只有三十萬元；以致所謂「書籍勞軍費」，雖然也算是一個科目，實際上全年的經費。卻只有區區八萬元，還不及給「軍友月刊」的補助，更不及給「青年戰士報」一個月的補助。其實，據我們所知，青年戰士報在國防部另有預算，職員更領有正式待遇，軍友社為甚麼還要拿「文化勞軍費」做人情，每年送給該報一百萬元以上的補助？青年戰士報更憑甚麼還要在「文化勞軍費」下揩油？至於該社自辦的軍友月刊，非但北向各分社硬性攤派，可在各分社季節勞軍款下各扣繳補助費三千元；而且還經常假借敬軍勞軍名義，拉取各種廣告，而可有一筆收入；憑甚麼也要在「文化勞軍費」下刮油？難怪所謂「建

辦³⁷。此外，並透過檢視軍人之友社歲入預算書中，指出歲入與收入間的矛盾情況，「歲入預算書的數字，都普遍列的很小，甚至有的收入根本沒有列在內，而實際可能收入的款項，卻為數甚大」，認為此漏洞必須澈底查究³⁸。

對當時各國民黨籍縣市長，以縣市政府公帑為國民黨地方黨部添購設備的情況，傅正在〈請投在野黨和無黨無派候選人一票！〉中針對此情況進行描述與批判，指出「原該為人民服務的縣、市長，却在利用職權，用公款專為國民黨服務了」³⁹。幫國民黨縣黨部主任委員修理車子、買輪胎、買新車、買設備等用途，當時傅正社論寫說基隆海水浴場就交給國民黨基隆市黨部經營，錢當然是歸國民黨黨部，並因為資金不夠，經營基隆海水浴場需要整修，因此另外先撥給 20 萬元讓國民黨黨部經營⁴⁰。傅正認

立醫院文庫」、「充實戰地文庫」云云，變成了欺騙軍人的謊言！一百四十餘萬元的「文化勞軍費」，是如此任意濫用，便不難推想其他各項勞軍費用，究竟是在如何開支了！另據歲出預算書的分配，其中「業務維持費」一款，便佔去一百一十餘萬元（一、一三八、五六〇元）之多，加上「轉發各分社經費」又佔去二百六十萬元，另加附表二與其他附表所載，福建省區社佔去經常費三十六萬餘元（三六八、四〇〇元）和現金給與經費八萬餘元（八四、五八八元），馬祖分社佔去經常費三十萬元和現金給與經費六萬餘元（六九、一三二元）。總計軍友社總社、分社、區社全年在維持業務方面所耗去的款項，共達四百五十八萬餘元（四、五六〇、六八〇元）之巨，約佔有全年總收入一千八百七十八萬元的四分之一。正在臺北市興建中的國軍英雄館，計達二百一十萬元之巨，卻連招標手續都沒有經過，傳說已經很嚴重，內情如何，顯然也大可懷疑」。社論（傅正），〈撤銷軍人之友社！〉，頁 4。

37 社論（傅正），〈撤銷軍人之友社！〉，頁 4。

38 社論（傅正），〈撤銷軍人之友社！〉，頁 6。

39 有關國民黨籍縣市長，以縣市政府公帑為國民黨地方黨部添購設備的描述，原文如次：「在去年四月間，便有嘉義縣長黃宗焜耗費公款約三萬元，替國民黨縣黨部主任委員修理座車和購買輪胎，以及臺中市長林金標一次撥款三萬餘元，給國民黨市黨部主任委員購置新車。至於基隆市長謝貫一，更乾脆把基隆海水浴場，交給國民黨基隆市黨部經營；以至一次便撥款二十萬元，給國民黨基隆市黨部作為『市黨部緊急應變費』。這種種，都說明了原該為人民服務的縣、市長，却在利用職權，用公款專為國民黨服務了」。社論（傅正），〈請投在野黨和無黨無派候選人一票！〉，《自由中國》22 卷 8 期（1960 年 4 月 16 日），頁 3。

40 原文如次：「去年四月間，便有嘉義縣長黃宗焜耗費公款約三萬元，替國民黨縣黨部主任委員修理座車和購買輪胎，以及臺中市長林金標一次撥款三萬餘元，給國民黨市黨部主任委員購置新車。至於基隆市長謝貫一，更乾脆把基隆海水浴場，交給國民黨基隆市黨部經營；以至一次便撥款二十萬元，給國民黨基隆市黨部作為『市黨部緊急應變費』」。社論（傅正），〈請投在野黨和無黨無派候選人一票！〉，頁 3。

為國民黨籍縣市長以縣市政府公帑為國民黨地方黨部服務，因此呼籲要票投給在野黨與無黨無派候選人一票⁴¹。此外軍人之友社看起來比較像民間，在捐錢、做勞軍等，可是再去看當時的資料就會發現，軍人之友社的預算等泰半都是國防部所核，包括勞軍捐在內⁴²，此為根目前所想像很大不同之處，因此也由此可知這些各種組織在不同時代，性質與互動，跟現在看到是不同的。現在看到也許完全正常，在過去有些問題，這是特別需要注意的地方，譬如目前在臺北市看到的國軍英雄館，現在來看一定是屬於軍方，這應該沒有什麼太大問題，但實際上在當時來講不是這樣，因為其與軍人之友社的財務有關係，當時的興建碰巧聽說沒有招標。

傅正在〈國庫不是國民黨的私囊—從民社黨拒受宣傳補助費說到國民黨把國庫當作黨庫〉中，透過民社黨發表聲明拒絕接受由政府國庫撥給反共抗俄宣傳補助費一事出發，將有關國民黨未經合法程序使用國家資源的情況，特就當時國民黨將國庫當作黨庫的情況，進行綜合性論說。由民主政治面向出發，指出政黨經費不應由國家負擔或支出「這是民主制度上一個鐵定的原則」⁴³，此舉不僅違反民主政治原則更與專制極權政府作法無異⁴⁴。而就國民黨將國庫當黨庫的心態，進一步做出分析，「以

41 社論（傅正），〈請投在野黨和無黨無派候選人一票！〉，頁4。

42 原文如次：「『不僅年度預算，應呈准國防部核定後照預算執行』，而且『國防部亦派有監察及稽核經常駐社』，乃至於『國防部觀察組』也可以『來社檢查』」。社論（傅正），〈撤銷軍人之友社！〉，頁4。

43 就此，原文如次：「環顧當世各先進民主國家，沒有一國的政黨經費准許由國庫開支，這是民主制度上一個鐵定的原則。可惜，我們自行憲以來，還沒有建立起這項優良制度」。社論（傅正），〈國庫不是國民黨的私囊—從民社黨拒受宣傳補助費說到國民黨把國庫當作黨庫〉，《自由中國》22卷11期（1960年6月1日），頁3。

44 對此，原文如次：「像國民黨這種搜刮黨費的手法，已經不止是違反民主政治的原則，而是與古今中外的專制極權政府，在本質上毫無兩樣。試想想：國民黨把國家當做一黨私產，而予取予求的做法，與古代專制王朝及今日蘇俄中共等共產極權，在本質上那裏會有絲毫的差異？中

革命英雄自居，以為天下是老子打來的，中華民國只是國民黨一黨的私產。因此，國民黨經常把國庫看成了黨庫」⁴⁵。這篇文章的子標題名稱很長「從民社黨拒受宣傳補助費說到國民黨把國庫當作黨庫」。民青兩黨最挺國民黨，來到台灣，國民黨透過宣傳補助費，如反共抗俄宣傳費⁴⁶，這筆錢撥款至少 1980 年代末期、1990 年代初期，假如真的是當做反共抗俄宣傳費也是一個名目，可能就出版雜誌等，可是為什麼民社黨會拒絕接受呢？其因在於國民黨透過補助費藉此扼住在野黨的喉嚨。「從民社黨拒受宣傳補助費說到國民黨把國庫當作黨庫」，這標誌著當時傅正認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係基本上民主國家是不會同意一個政黨經費是由國庫來支付⁴⁷，可是中華民國體制並未建立起優良制度，因此傅正認為這個問題的原因就是這個部分沒有釐清。

此外，針對在大學開設三民主義研究所，則主要為「豢養幾個專吃主義理論飯的食客」，另開辦中山獎學金留學考試則僅為了「培植國民黨忠貞幹部」⁴⁸。其中國民黨經費來源為何，傅正

國畢竟是中國人的中國，而非國民黨的中國。中華民國是屬於全中華民國的國民，而非屬於國民黨，尤非屬於國民黨的少數當權分子」。社論（傅正），〈國庫不是國民黨的私囊——從民社黨拒受宣傳補助費說到國民黨把國庫當作黨庫〉，頁 4。

- 45 針對國民黨將國庫當作黨庫的心理層次分析，原文如次：「國民黨把持中國政權幾十年以來，其間雖歷經軍政、訓政、而憲政，但却始終以革命英雄自居，以為天下是老子打來的，中華民國只是國民黨一黨的私產。因此，國民黨經常把國庫看成了黨庫，予取予求；甚至透過政府的權力，運用種種手法，搜刮黨費」。社論（傅正），〈國庫不是國民黨的私囊——從民社黨拒受宣傳補助費說到國民黨把國庫當作黨庫〉，頁 3。
- 46 社論（傅正），〈國庫不是國民黨的私囊——從民社黨拒受宣傳補助費說到國民黨把國庫當作黨庫〉，頁 3。
- 47 原文如次：「環顧當世各先進民主國家，沒有一國的政黨經費准許由國庫開支，這是民主制度上一個鐵定的原則。可惜，我們自行憲以來，還沒有建立起這項優良制度」。社論（傅正），〈國庫不是國民黨的私囊——從民社黨拒受宣傳補助費說到國民黨把國庫當作黨庫〉，頁 3。
- 48 就此，原文如次：「最近，又在台灣各大學的研究所尚沒有固定經費的今日，為了豢養幾個專吃主義理論飯的食客，還耗費四十萬元的開辦費，添設了一個三民主義研究所；甚至在大專畢業學生連自費出國也十分困難的今日，為了培植國民黨忠貞幹部，又耗費美金三、四萬元以上，辦理中山獎學金留學考試」。社論（傅正），〈國庫不是國民黨的私囊——從民社黨拒受宣傳補助費說到國民黨把國庫當作黨庫〉，頁 3。

在文中直接明確指出「國民黨搜刮黨費的主要手法，便是透過政府主管單位的權力，公開列入政府預算，甚至乾脆將整個組織納入政府機關，變成行政單位的一部分」⁴⁹。甚至國民黨各級黨部將自己當作政府單位，而強行佔有大量公有房屋土地⁵⁰，另部分黨產的來源則是來自於戰後日產的不正當性接收，如電影院以及若干旅館⁵¹。並且，諸如黨營事業 - 中國電器公司、中國廣播公司等，則利用政府權力除造成獨佔市場的情況，更進一步建構其公營的地位，其它如蘋果的進口、砂糖的出口，以及黨報、官報等，乃至青年救國團底下的幼獅出版公司，皆透過特權而獲取超

49 針對國民黨搜刮黨費的方式，原文如次：「國民黨搜刮黨費的主要手法，便是透過政府主管單位的權力，公開列入政府預算，甚至乾脆將整個組織納入政府機關，變成行政單位的一部分。普遍設立在軍隊中的特種黨部，人員都已列入政工編制之內，一切費用由佔全國總預算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軍費項下開支，已經是人所共憤。普遍設立在各公營事業內的產業黨部、郵電黨部、公路黨部、鐵路黨部等，其人員或列入正式編制，或寄名在所隸行政單位，其經費更照例編入各單位預算；有的黨部甚至把黨部招牌，公然掛在所隸行政單位的大門之上；這些也已經是人所共知。現在我們僅舉台灣省黨部和縣市黨部的情形，來稍加說明。台灣省黨部雖未納入省政府編制內，但每年却照例可由省政府獲得經費，完全如同省政府的附屬單位。台灣省黨部每年由省政府各單位所得款項，遠在四十五年便已高達二千八百多萬元，四十六年又增加到三千一百多萬元，現更年有增加。這些都是在教育廳、社會處、警務處等預算內列支的。至於縣市黨部，形式上雖未納入政府組織之內，實際上却和政府單位一樣，每年可由縣市政府獲得固定經費。當最近我們細細看去年六、七月內臺北市議會內國民黨黨團的黨員大會紀錄、幹事會紀錄、各小組會議紀錄彙輯、黨員大會座談會紀錄、以及幹事小組長及審查會召集人同志聯席會議紀錄等，發現國民黨的市議員，在討論審議四十八年度總預算時，居然一再作成「黨務經費分筆支持通過」之類的決議。好像這些人出來競選市議員，就是為國民黨搜刮黨費而來；就在使得臺北市黨部的經費，也由全臺北市的市民來負擔。至於各縣市黨部以下的區黨部，更假借「民眾服務站」的名義，變成了縣市政府的一個附屬單位，一切人事費業務費由縣市政府負擔，列有正式預算」。社論（傅正），〈國庫不是國民黨的私囊——從民社黨拒受宣傳補助費說到國民黨把國庫當作黨庫〉，頁 3-4。

50 對此，原文如次：「國民黨的各級黨部，已經有形無形構成政府單位的一部分，可以把政費當做黨費！至於國民黨各級大小單位，早已如同政府單位分別佔有大量的公有房屋土地。大家只要看看臺北市一個小小區黨部，便在中山北路用「中山區民眾服務站」的名義，佔有一幢三層樓的大樓，就可想見一切了」。社論（傅正），〈國庫不是國民黨的私囊——從民社黨拒受宣傳補助費說到國民黨把國庫當作黨庫〉，頁 4。

51 針對國民黨將戰後日產不當轉為黨產之描寫，原文如次：「臺北市的台灣、國際、大世界、新世界等幾家大的電影院，以及全省各地若干旅館，本來是日產，由於全國人民浴血抗戰的結果，終於從日本人手裏接收過來，當然應該是國家的公產，現在却成了國民黨一黨的私產來營利」。社論（傅正），〈國庫不是國民黨的私囊——從民社黨拒受宣傳補助費說到國民黨把國庫當作黨庫〉，頁 4。

額的利益或銀行貸款⁵²。而縱使連美援亦成為援助國民黨黨費的來源之一⁵³。

< 國庫不是國民黨的私囊—從民社黨拒受宣傳補助費說到國民黨把國庫當作黨庫 > 這篇文章，是作為黨產研究重要的一篇文章，而若注意那篇文章發刊時間，已經到 1960 年 6 月，《自由中國》營運已接近尾聲。《自由中國》假如沒有被停刊，以傅正這樣繼續追查的結果，將會愈追愈多。透過傅正有關國民黨黨產相關論述，提供今天針對黨產問題重要思考方向：(1) 國庫被國民黨運用，不是一定直接將錢用在國民黨黨庫。(2) 財產轉移不一定是移轉給國民黨中央或地方黨部，這也是需要理解之處，此外就是移轉過程的不當得利所得，即透過黨國關係取得的資產正當性討論⁵⁴。

1950 年代到 1960 年代間，傅正在《自由中國》針對當時國民黨不當利益所得發表數篇文章，並進一步分成收益來源、主要運作組織、收益用途、特許行業、套利貿易、影響民主發展等

52 針對國民黨相關黨營事業利用特權形成獨佔市場的描述，原文如次：「電燈的製造，本來有若干民營公司，但由國民黨經營的「中國電器公司」，却利用政府權力，硬性合併了其他幾家公司，造成獨佔市場，以便粗製濫造營利。至於中國廣播公司，本來是國民黨一黨的黨營事業，却又在利用政府權力造成公營地位，享受一切優越待遇後，近又企圖扼殺全省民營電臺，造成獨佔市場，作為「養黨」的手段。乃至於蘋果的進口、沙糖的出口、馬戲團之類娛樂團體的來臺出演等等，也無一不被國民黨利用為搜刮黨費的手段！至於各種黨營事業如中央日報社、中華日報社，乃至青年救國團的幼獅出版公司等等，都可以動輒向台灣銀行貸款百萬元之多，無異把台灣銀行當做國民黨的基金保管會了！等而下之，作為國民黨黨報的中央日報，非但平時可利用黨和政府的力量強銷，而且還可以隨時藉故強迫機關、團體、公司、商行刊登廣告」。社論（傅正），〈國庫不是國民黨的私囊—從民社黨拒受宣傳補助費說到國民黨把國庫當作黨庫〉，頁 4。

53 對於美援成為援助國民黨黨費之事，原文如次：「又由於國民黨在郵電、鐵路、產業等單位，也普遍設立了黨部，動用各有關單位的經費，所以美國在這方面的經濟援助，實際上又有一大部分變成援助國民黨的黨費了」。社論（傅正），〈國庫不是國民黨的私囊—從民社黨拒受宣傳補助費說到國民黨把國庫當作黨庫〉，頁 4。

54 有關不當利益透過黨國體制運作而取得的討論，參見黃世鑫，〈正義重建抑或政黨公平競爭？--評中國國民黨黨產之處理兼論政黨財源問題〉，頁 85-86、90-91。

層面進行評述。在收益來源部分，主要利用強制性捐獻、金融機構低利貸款、美援乃至政府直接編列預算等方式，再透過如救國團、國軍英雄館、軍友社等非政府機關的附隨組織進行黨務活動運作，另一方面，再藉由如中國廣播電台、中國電器公司等因政府權力作用而獲得獨佔市場的黨營事業，以及包括如蘋果及砂糖等限定進出口貿易，此外也包括戰後日產直接接收等逐漸勾勒出龐大的不當收益網絡，後匯流挹注黨費。通過充裕的黨費支應，一方面建構並鞏固強人威權體制，甚至包括教育體制也藉由在國內開設三民主義研究所，同時開辦中山獎學金留學考試等，自下而上培植國民黨忠貞幹部。另一方面，則逐步限縮台灣自由空間與影響民主發展，利用政府力量打擊民營辦報，也透過補助其他政黨經費，藉此箝制與監控政黨政治運作。

肆、結論

本文透過數位人文取徑的嘗試應用，一方面透過資訊工具的實驗產出，對於人文閱讀結果進行驗證；另一方面，將實驗結果結合人工判讀的科技整合模式，從不同側面對於傅正有關黨產議題進行理解。此外，再進一步應用實驗量性數據繪製圖表的視覺化效果，而對於黨產議題有關詞彙的多寡量數情況、不同年度的消長分布以及關聯網絡情況進行觀測與呈現。因為雷震的良好黨政關係《自由中國》得以相對較少於其他報章刊物受到政府的干擾與壓制，也因此透過《自由中國》能夠對於 1950 年到 1960 年的台灣社會思潮進行理解。而傅正身為《自由中國》編輯委員除具備一定代表性外，其在《自由中國》所發表多篇有關黨產議題的文章也是值得現在思索與參考的。

檢視傅正在《自由中國》撰寫有關黨產議題文章，可以發現幾個有趣的情況：首先，有些題目名稱看起來跟黨產沒有關係的文章，譬如〈扼殺民營報紙的又一辦法〉、〈撤銷軍人之友社！〉、〈請投在野黨和無黨無派候選人一票！〉等，而此情況透過資訊工具進入文本的探勘與偵測，也發現傅正不僅在題目擬定，在內文撰寫也未使用過黨產此一詞彙，而是透過如黨產來源、黨產用途以及附隨組織其他方面進行論述與討論。再者，也可以發現 1958 年到 1959 年間，傅正有關黨產文章所討論者，主要集中在救國團、黨報、官報以及軍友社等議題上，1960 年開始包括黨營事業、黨庫、國庫、黨費等開始出現在文章討論內容中，這樣情況標誌著，傅正在針對黨產議題時，係如同剝洋蔥般由遠而近、由外而內、由周邊附隨組織再到國民黨中心進行的寫作軌跡。

進一步分析傅正在《自由中國》有關黨產議題文章，可以發現傅正透過收益來源、主要運作組織、收益用途、特許行業、套利貿易、影響民主發展等層面，針對當時國民黨整體不當利益所得網絡進行論述。1950 年代到 1960 年代間，救國團與軍友社等附隨組織被視作不當利益所得的主要運作場所，因此國庫被國民黨運用，不是一定直接將錢使用在國民黨黨庫，換言之，財產轉移過程不一定是移轉給國民黨或國民黨下面的相關機構，這是值得留意之處，此外，移轉過程的不當利益所得，透過黨國關係取得的資產正當性與否，這也是值得深入探討的。最終，透過各種不當利益所得挹注的黨費，其用途一方面藉此逐漸建構出強人威權體制，另一方面也透過補助其他政黨方式，藉此箝制與監控政黨政治運作，而影響國家正常化與民主發展。不過，本文係以傅

正在《自由中國》有關黨產議題文章作為撰寫主軸，雖然傅正的編輯委員身分具備一定代表性，但無法因此而表示整體《自由中國》對國民黨黨產的觀點與立場，這是須特別說明之處。

本文通過數位人文途徑針對傅正在《自由中國》有關黨產議題文章進行分析研究，而數位人文途徑的科技整合機制特色：利用資訊工具輔助由文本資料中採擷出主要概念與意識，再透過人文研讀的處理進一步進行內容詮釋，科技應用克服人類處理大量資料的生理性侷限，人文研讀則補足科技應用的機械式操作制約，本文結合量性與質化研究的途徑模式，在研究應用上有值得其他後續研究者借鏡與援引之處。

參考文獻

1. Bol, Peter K., "Historical Research in a Digital Environment", 《第三屆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研討會論文集》，2011年12月1-2日，國立台灣大學，頁1。
2. 王汎森，〈歷史研究的新視野：重讀〈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古今論衡》11期，2004年，頁1-12。
3. 李峻德、曾馨瑩，〈公民數位典藏平台之使用者研究〉，《第三屆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研討會論文集》，2011年12月1-2日，國立台灣大學，頁285-301。
4. 林滿紅，〈數位化：史學與社會結合的一大契機〉，項潔（主編），項潔（主編），《數位人文在歷史學研究的應用》，臺北：臺大出版中心出版：臺大發行，2011年，頁45-71。
5. 社論（傅正），〈扼殺民營報紙的又一辦法〉，《自由中國》19

卷 6 期，1958 年 9 月 16 日，頁 6。

6. 社論（傅正），〈青年反共救國團問題（「今日的問題」）之十二〉，《自由中國》18 卷 1 期，1958 年 1 月 1 日，頁 5-7。
7. 社論（傅正），〈國庫不是國民黨的私囊—從民社黨拒受宣傳補助費說到國民黨把國庫當作黨庫〉，《自由中國》22 卷 11 期，1960 年 6 月 1 日，頁 3-4。
8. 社論（傅正），〈撤銷軍人之友社！〉，《自由中國》21 卷 7 期，1959 年 10 月 1 日，頁 4-6。
9. 社論（傅正），〈請投在野黨和無黨無派候選人一票！〉，《自由中國》22 卷 8 期，1960 年 4 月 16 日，頁 3-4。
10. 邱偉雲，〈關鍵詞叢與文本意義挖掘的嘗試：以《清季外交史料》為例〉，項潔（主編），《數位人文在歷史學研究的應用》，臺北：臺大出版中心出版：臺大發行，2011 年，頁 159-188。
11. 金觀濤、邱偉雲、劉昭麟，〈「共現」詞頻分析及其運用 - 以「華人」觀念起源為例〉，《第三屆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研討會論文集》，2011 年 12 月 1-2 日，國立台灣大學，頁 199-223。
12. 洪一梅，〈論檔案檢索工具的權威控制系統〉，檔案管理局（編），《檔案資訊資源管理》，臺北市：檔案管理局，2004 年，頁 411-434。
13. 陳和琴，〈Metadata 與數位典藏之研討〉，《大學圖書館》5 卷 2 期，2001 年 9 月，頁 2-11。
14. 陳品諺、彭維謙、項潔，〈《清實錄》之文本分析與時間標記初探〉，《第三屆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研討會論文集》，2011 年 12 月 1-2 日，國立台灣大學，頁 257-272。

15. 陳詩沛、杜協昌、項潔，〈史料政體分析工具之幕後 - 介紹「台灣歷史數位圖書館」的資料前置處理程序〉，項潔主編，《從保存到創造：開啟數位人文研究》，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1年11月，頁51-66。
16. 項潔、涂豐恩，〈導論 - 什麼是數位人文〉，項潔主編，《從保存到創造：開啟數位人文研究》，臺北：臺大出版中心出版：臺大發行，2011年，頁9-28。
17. 項潔、翁稷安，〈數位人文與歷史研究〉，《數位人文在歷史學研究的應用》，臺北：臺大出版中心出版：臺大發行，2011年，頁11-20。
18. 黃世鑫，〈正義重建抑或政黨公平競爭？ -- 評中國國民黨黨產之處理兼論政黨財源問題〉，《月旦法學》92期，2003年1月，頁77-91。
19. 黃寬重，〈數位典藏與人文研究 - 中央研究院文獻資料數位化工作的回顧與展望〉，《漢學通訊研究》20卷8期（總78期），2001年5月，頁68-74。
20. 廖彩惠、陳泰穎，〈從文明科技發展看數位典藏的時代意義 - 本質、迷思與發展趨勢〉，《國家圖書館管刊》98年2期，2009年8月，頁85-108。
21. 薛化元，〈傅正與黨產研究 學術研討會主題演講 黨產研究之父：傅正〉，《黨產研究》3期，2018年10月1日，頁133-142。
22. 謝顯丞、錢曉珊、黃淑屏，〈數位典藏之推廣應用與社區服務 - 以鳳甲美術館刺繡館藏為例〉，《圖書與資訊學刊》3卷1期（總76期），2011年2月，頁26-49。